

论社会性别视域下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

何 玮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清末民初是近代学校教育确立的重要时期,女子学校教育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文章聚焦清末民初政府的女子教育政策,剖析其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重新界定及塑造的历史过程。随着女性作为未来国民母亲的教育功能被“发现”和“挖掘”,女性最终被纳入近代教育体系中。“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及“家政学教育”三大课程模块的设置,旨在将“女性”定位于家庭。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设定为必修科目,意味着以往衡量女性“才”与“不才”的诗词等标准退却到边缘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近代科学知识的习得。女性的知识结构被重新界定,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意义及内涵也随之被重新书写。

关键词:社会性别;近代女子教育;家政学教育;近代科学知识

DOI:10.3969/j.issn.1671-2714.2015.00.008

从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中孕育而来的社会性别概念,如今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为探讨性别间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思维范式。美国著名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曾将这一概念成功导入历史学研究,为重新书写历史尤其是两性间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和空间。按照斯科特的阐释,“社会性别”是“赋予肉体差异不同的理解及认知”^①,它既是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又是标记权力关系的手段和方法,因而这一概念成为探讨两性关系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立足于社会性别学的历史研究,应聚焦历史变迁中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而非某一源起或结果呈现,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下话语建构本身及其背后隐含的性别政治构图。^②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思想的冲击和裹挟下逐步迈向近代,近代学校教育的确立与发展是其中重要一环。从社会性别学角度来看,女子

被纳入近代教育体系是女性被重新书写、赋予近代内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从前近代迈向近代,知识被重新界定,女性必须习得的知识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种不同于前近代社会的女性规范和新的价值观应运而生。它就像一枚经过修正的指南针,约束、引导女性向所谓“正确”的方向迈进。换言之,伴随着近代学校教育的导入,其在重塑女性及其知识结构方面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从这层意义来说,探究中国社会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诞生及形成过程,是思考“女性”如何被纳入近代化轨道的重要途径。

清末民初是近代学校教育确立的重要时期,女子学校教育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问题在于,这一转变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女性这一社会性别被赋予了何种意义,身处传统与近代的十字路口,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确立了何种有别于传统的女性规范,反映在教育理念及课程设置中的

收稿日期:2014-12-17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5-08-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3YJCZH051);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S100-C-1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WS1322001)

作者简介:何玮,女,山西灵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近代女子教育、中日思想文化比较以及社会性别。

①②スコット、ジョン・W:《増補新版ジェンダーと歴史学》,荻野美穂译,平凡社(东京)2004年版,第24页。

性别书写中呈现出何种特点?多年来探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已有不少,但鲜有针对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以清政府正式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及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等史料为主要分析文本,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近代女子教育正统性及话语权的获得

受“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前近代的中国女性在生活空间、知识习得及运用等方面与男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抛头露面等进入公共领域的行为更被视为上层女性的禁忌。正因如此,当西方的女子教育经传教士引入到中国时,以清政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其表露出抵触之情。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新事物对近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癸卯学制》与母亲教育功能的肯定

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但是,此时的近代学校教育并未将女性纳入这一体系中。

女学原不仅保育幼儿一事,而此一事为尤要;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幼儿身体断不能强,气质习染断不能美。蒙养通乎圣功,实为国民教育之第一基址。^①

《癸卯学制》中清政府从“母教”的角度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但对设立女学堂一事表示明确反对。

“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所谓“断不相宜”之处,即“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伴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于是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②

清政府从为国民提供优质教育的角度出发,发现了“母教”的重要性,进而承认女性受教育的意义。但同时考虑到如果认可女子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就意味着女性不仅可以进入公共场所,更可藉此开阔视野成就独立的见地与思想,这是对传统儒家伦理纲常的冒犯。对此,清政府深感恐惧并极力要防患于未然,于是便有了上述的折中之策,即一方面从培养优质国民的角度出发承认女性受教育的意义,同时深感照搬西方、日本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会对传统礼教带来冲击,提出由其母亲或乳母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

针对“家庭教育”该如何开展,提出“应令各省学堂将《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及《教女遗规》等书,择其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分别次序浅深,明白解说,编成一书,并附以图,至多不得过两卷,每家散给一本;并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若日本下田歌子所著《家政学》之类),广为译书刊布。其书卷帙甚少,亦宜家置一编。此外如初等小学字课本及小学前二年之各种教科书,语甚浅显,地方官宜广为刊布。”^③

也就是说,清政府仅对教科书做了初步规定,并未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

作为清政府正式实施的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包括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整套体系,却将女性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认为“家庭教育”是最合适、稳妥的办法。具体该如何实施,学制并未从教授内容、层次等方面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论及具体教授内容时,也仅随意地列举一些传统女教的书目及外国书籍等,明显缺乏缜密思考及详细规划。《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既显示出清政府对发展以男性为培养对象的近代学校教育的决心,也显现出对旧有性别规范的难舍、固守之情。换句话说,对培养未来优质国民持坚定态度,但在如何教育女性方面举棋不定。尽管如此,清政府仍从近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对女性受教育的意义给予了肯定,其态度为日后倡导女学埋下了伏笔。

①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6 页。

②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4 - 396 页。

③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5 - 396 页。

(二)《奏定女学堂章程折》与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诞生

《癸卯学制》实施后仅三年,学部提交了《奏定女学堂章程折》,在论及女学建设时指出:

方今朝廷锐意兴学,兼采日本、欧美规制,京外臣工条奏请办女学堂者不止一人一次,而主张缓办者亦复有人。臣等每念中外礼俗各异,利弊务宜兼权。自钦派学务大臣以至设立学部以来,历经往复筹商,亦复审慎迟回,未敢轻于一试……惟近日臣等详征古籍,博访通人,益知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创立女学堂者所在多有。臣部职任攸关,若不预定章程,则实事求是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务虚名者或不免转滋流弊……其已开办各女学堂,务须遵照此次奏定章程,以示准绳。^①

从持反对态度到有感于设立女学的必要,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促使这一改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各地创办女学堂之风已势不可挡。换言之,为了控制不可逆转的局势变化,清政府试图通过制定规章来控制和管理民间的女学堂,从而迈出了承认女子学校教育的第一步。

《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学科程度章》对发展女子学校教育的必要性作了如下阐述:

家国关系至为密切,故家政修明,国风自然昌盛;而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礼法。又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学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为补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之良善,端赖贤母;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凡为女子师范教习者,务于此旨体认真切,教导不怠。^②

和谐、美满的家庭需要知书达理的女性,这就要求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如此,未来国民的培养、良好的家庭教育唯有“贤母”才能胜任,而女子教育正是培养“贤母”的关键。清政府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对创办女子学校给予充分肯定,当然其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勉强和为事实所迫的言不由衷。也正因此如此,清政府仅为

女性提供了两个层次的学校教育,即小学和师范教育。女子师范学堂修业年限为4年,是当时女性最高级别的教育机关,仅相当于当时男性的中等教育机构。也就是说,零散、不成体系及降低对女性的要求,是这一阶段女学政策的特点。但相较之前对创办女学堂的否定态度,清政府这一时期的态度已发生了重大转变。

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与清政府对“女性”社会性别的书写

笔者以《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课程设置为例,探讨清政府对女子教育的定位及特点。

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徽之风俗。^③

“女子师范学堂教育总要”中首先强调了“修身”科目的特殊地位,这正是改革派“中体西用”论的表现。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提起的奏折——《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就曾强调“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④

正因如此,“修身”课程当仁不让地成为女学之要务。除此之外,图画、音乐、体操、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数、格致、家事、裁缝和手工艺等12门科目也被设定为授课内容(见表1)。

就整体结构而言,女子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及“家政学教育”三个部分,而同等程度面向男性的初级师范学堂则仅包括“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个部分。“家政学教育”彰显了女子师范学堂在课程设置上的结构性特点,亦是其鲜明的特色所在。在为期4年的修业年限中,“家事”“裁缝”及“手工艺”三门

①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页。

②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577页。

③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6页。

④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表1 女子师范学堂课程设置状况^①

课程名称	周课时数/课时	比例/%	
通识教育	修身	8	21.32
	图画	7	
	音乐	6	
	体操	8	
专业教育	教育学	24	50.74
	国文	12	
	历史	6	
	地理	6	
	算数	13	
	格致	8	
家政学教育	家事	8	27.94
	裁缝	15	
	手工艺	15	
合计	136	100.00	

课程的授课总量占总课时数的 27.94%，意味着女学生在师范学堂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学习家政。具体的学习内容可以通过家事科目的相关规定领略一二。

其要旨在使能得整理家事之要领，兼养成其尚勤勉、务节俭、重秩序、喜周密、爱清洁之德性……授衣食、居处、看病、育儿、家计、簿记及关于整理家政之一切事项；并授以教授家事之次序法则。^②

也就是说，家事科目在于传授家政管理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女性与家政管理之间构架出某种必然联系，让女性对其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与成就感，这才是“家政学教育”的宗旨所在。

这种性别差异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的整个结构上，也体现在具体课程的安排上。从授课内容看，初级师范学堂中设置了“讲经读经”课程，其课时数仅次于专业科目中最为重要的“教育史·教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见表2）。

学生年岁已长，故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以备将来学成经世之用……讲《左传》宜解说其大事与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讲《周礼》宜阐发先王制度之善，养民教民诸政之详备，与今日情形相类可效法者。^③

为日后学生步入社会做好相应的理论准备是“讲经读经”课程设置的初衷，其中的“经世之用”体现了清政府对传统的传承，详细地说，沿袭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定位。“读经讲经”课程在女子师范学堂的缺失，表明了清政府对女性步入公共领域有所顾虑。

表2 初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状况^④

课程名称	周课时数/课时	比例/%	
通识教育	修身	5	41.67
	读经讲经	45	
	习字	8	
	图画	7	
专业教育	体操	10	58.33
	教育史·教育学	47	
	中国文学	10	
	历史	11	
	地理	9	
	算数	15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7	100.00
	博物	6	
合计	180	100.00	

此外，在教育内容的深度及宽度方面同样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教育学”作为师范类学校的核心课程，在女子师范学堂中为 24 课时，而在初级师范学堂中为 47 课时，前者仅为后者的一半。其他如历史、地理等课程，亦存在男女不同。正因如此，女子师范学堂与初级师范学堂修业年限同为 4 年，但总课时量分别为 136 课时和 180 课时，前者比后者少了近四分之一的课时。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知识突出的是信仰与伦理性，传统教育的本质在于将受教育者纳入社会秩序与伦理关系中来，培养其协调与控制自身的内在能力，^⑤那么女子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无疑凸显了对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视以及对传统男女社会定位的沿袭。但是，也不能忽略其“近代性”的一面，即有目的、有步骤地将诸如“算学”“格致”等近代科学知识转化为课程，将以往从人伦角度而言毫无意义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关事物原理

①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80 页。

②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79 页。

③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2 页。

④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8 - 410 页。

⑤ 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中国教育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8 页。

或机理的解释性知识、专科性知识添加进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推进、因果论等近代科学精神,^①亦被导入到女子教育中来,从教学内容来看已明显具备近代教育的特征。

不仅如此,4年学制的设定和对各项管理章程的规定等一系列章程的出台,意味着清政府通过建章立制,认可了学校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了近代教育体系。此外,家事科目的培养宗旨将明治政府1901年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实施规则》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教材也多是日本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后加以使用。^②这些举措说明清政府积极向国外取经,尤其对日本的女子教育持汲取借鉴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由于态度转变过快,以至于从授课宗旨到教科书的设定均难免仓促。

总之,“家政学教育”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的结合,教学内容及教学课时量上存在的男女差别,是当时女子教育政策的特点所在,也集中体现了清政府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的阐释,即将女性定位于家庭,既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也尝试近代科学教育。

清政府在创办女学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对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906年、1907年和1908年的女学堂数量分别为245所、402所和512所,学生人数分别为6791人、14658人和20557人。^③与颁布女学政策之前的1906年相比,1907年女学堂的数量增长了六成多,而到了1908年更是增长了一倍以上。与此相对应,女学生人数也呈现出激增趋势。

三、民国政府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位

经过渐进式改革,清政府以追认的方式将女子教育纳入近代教育体系中,此举无疑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是风烛残年,之后民国政府的女子教育理念是决定女学走向的重要因素。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演讲时强调:

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处于今(今)日,自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女界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国。^④

这段话表明,只有实现了男女平等,方能建设真正的共和国,而发展女子教育正是女性获得平等自由权力的有效路径。在这样的逻辑推断上,孙中山将发展女子教育视为民国创立伊始之急务。

1912年~1913年,民国政府出台了《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较,《壬子·癸丑学制》在女子教育方面增设了女子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及高等师范教育。这意味着面向女性的普通学校教育体系趋于完备,包含了初等、中等及高等三个阶段。不仅如此,女子实业教育也充实了旁系教育体系。这些举措均表明了民国政府将女子教育引向深入的决心。

但是,受传统习俗和军阀割据导致教育经费连年不足等因素影响,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迟迟未开,实业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仅女子中等教育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女子中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统计数据显示,1912年~1915年间全国中等教育机构在籍的女学生数约为1万人,女子中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基本维持在100所。^⑤那么这些女子中等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及其特点何在,所谓的男女平权又蕴含了何种含义?

在论及中学教育及中等师范教育的总体目标时,民国政府强调培养健全的国民,并未彰显性别差异。同时,在科目设置、课时数等方面,男女中学、师范学校也有诸多共性。比如,中学教育方面专业知识的传授均侧重国文、外国语及数学三门课程,课时数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及法治经济等课程的教学大纲与教授内容设定方面,男女中学基本保持一致(见表3、表4)。

①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中国教育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96页。

②杉本史子:《民国初期における女子家事科教育—その「近代」性と限界について—》,《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2002年版第4期,第4页。

③廖秀真:《清末女学在学制上的演进及女子小学教育的发展(1897—1911)》,出自李又宁、张玉法:《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二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24-228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7-358页。

⑤数据根据多贺秋五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第853-855页整理。

表3 女子中学的课程设置及课时状况^①

课程名称	周课时数/课时	比例/%	
通识教育	修身	4	15.04
	图画	4	
	乐歌	4	
	体操	8	
专业教育	国文	23	71.43
	外国语	24	
	数学	14	
	历史	8	
	地理	8	
	博物	8	
	物理化学	8	
	法制经济	2	
	家政学教育	手工	
家事园艺		6	
裁缝		8	
合计	133	100.00	

表4 男子中学的课程设置及课时状况^②

课程名称	周课时数/课时	比例/%	
通识教育	修身	4	18.25
	图画	5	
	乐歌	4	
	体操	12	
专业教育	国文	24	78.83
	外国语	31	
	数学	19	
	历史	8	
	地理	8	
	博物	8	
	物理化学	8	
	法制经济	2	
	技能教育	手工	
合计	137	100.00	

然而,十分相近的表象之下,还存在十分明显的结构差异。与以男性为招收对象的中学及中等师范学校相比,“家政学教育”是女子中学及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大特色。作为“代价”,女子中学在国文、外国语及数学这些专业课程的课时上均少

于男子中学,在数学课的授课大纲中还规定“女子中学数学可减去三角法”^③。女子师范学校更是将外语课定为学生可任意选择的“随意科”。^④而在面向男性的中等师范学校,外语课是必修课,课时密集程度仅次于国文,位列第二,^⑤在所有教学科目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就是说,在总体知识结构及不同课程重要性的排序问题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男性而言,国文、外国语及数学这三门课程是专业课程中的重中之重,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面对女性,民国政府在降低要求的同时突出了“家政学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女子师范教育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如果说增设女子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及高等师范教育的规定,显示了民国政府拓展女子教育空间和进一步发展女子教育的决心,那么“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及“家政学教育”三大板块的设置,说明了其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的诠释——将女性定位于家庭,冀望她们掌握与家政管理相关的知识,以便日后胜任“贤妻良母”的职责。同时,也体现了民国政府对“男女平权”思想的理解,即男女在人格和受教育权利上平等,但在承担社会角色上不平等。一言以蔽之,延续清末的女子教育模式,同时试图拓展女性的受教育空间,是民国政府的女子教育特点所在。

四、结 语

尽管“女子无才便是德”早已成为前近代社会女性规范的缩影,但近年来高彦颐^⑥、伊沛霞^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经典小说《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等一众才女的刻画,都让人们领略到那些精于诗词、琴棋书画等上层女性的精彩生活。她们的才情作为上层女性的个人修养及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娱乐方式获得了认可,与此相对,对公共领域妄加议论的行为被视为禁忌。

①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2 页。

②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1 页。

③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0 页。

④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78 页。

⑤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81 页。

⑥ Dorothy Ko:《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⑦ Patricia Ebrey:《内闾——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胡志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伴随着中国被西方裹挟着步入近代,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的意义及内涵被重新书写。如前所述,清末民初随着女性作为未来国民母亲的教育功能被“发现”和“挖掘”出来,女性最终被纳入近代教育体系中。“家政学教育”“通识教育”及“专业教育”三大课程模块的设置,旨在将女性定位于家庭。将数学、历史、地理等设定为必修科目,意味着以往衡量女性“才”与“不才”的诗词等标准退却到边缘位置,取而代之的是近代科学知识的习得。显然,这种衡量标准的转变直指近代国家建设,正所谓“教育知识从来不是

一个隶属于学校教育本身的变量,而是外在于学校教育,作为国家统治的衍生工具而存在的量。”^①

站在历史变迁的十字路口,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可回避地要在传统与近代之间作出选择。尽管这些艰难的抉择还是被后世贴上了落后、消极的标签,却是历史的惯性与近代新事物此消彼长、相互融合的产物。我们从中窥见了一段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女学政策最终改变了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的意义及内涵,预示着一批有别于传统的近代女性的诞生。

Rise of the Modern School Educa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Social Gender Perspectives

HE We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significant period in which modern education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and meanwhile,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schools also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scrat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government's women education policy during that period, and diss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n the defi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ender-“female”. From the conclus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females, as the “mothers”,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s were “excavated” and “found”, and eventually, they were brought into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The setup of the three modules including “the Education of Home Economics”, “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eant that females were positioned in families. In the meantime, setting up Mathematics, History and Geography as compulsory modules, the poetry standards of “talent” and “non-talent” were retreated to the edge position in favor of the acquisi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structure of females' knowledge was re-defined, and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females were rewritten.

Key words: social gender; modern education of women; education of home economics; mod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责任编辑 毛红霞)

①吴刚:《知识演化与社会控制——中国教育知识史的比较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